

面，而且理论上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有明显的误区和局限。“文革”中，华侨华人研究受到严重冲击，相关研究完全停止。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的领域、深度、广度和规范性都有了很大改变，论文和著作数量上也有飞跃性的进步。目前，不仅是历史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扩展，研究地域延伸到东亚、欧洲、非洲、大洋洲、南美洲等地，研究内容也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信仰等各个层面。此外，学者们不仅研究海外华侨华人，也重视研究归国华侨和侨乡，研究内地侨乡与海外华人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研究领域。

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受到当代学者的重视是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研究的一大特色。从目前学术界情况看，新移民的研究异军突起，各类对策性研究也广泛进行，形成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发展态势。让华侨华人研究走出书斋，积极为中国当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研究的重大变化和成就之一。

重视田野考察、实地调研，注重原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研究的另一特色。从近年国内相关文献资料的大规模拓展来看，这是新时期华侨华人研究取得令人瞩目成果的重要基础，也为今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良好基础。

注重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研究的特点之一。中国改革开放后，大批学者走出国门，积极吸收海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理念，改变过去闭门造车的局面，将华侨华人研究大大向前推进。尤其是一些海外留学回国的学者，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和对话，不断将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成果推向海外，为中国相关研究迈向国际学术高地打下坚实的基础。华侨华人研究的规范性、国际性大大加强，从而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华侨华人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然而，毋庸讳言，目前国内的研究还存在许多问题。学风不正、缺乏规范等现象屡见不鲜。一些论文和著作粗制滥造，无论在材料、观点和方法论上都缺乏基本的学术创新，甚至连基础性的学术史工作、注释工作都付之阙如。我期望与国内学术界同仁共同努力，尽可能消除这些不正常现象，共同促进华侨华人研究在中国的进一步繁荣。

## 海外华人社会的新现象及其解释：学术挑战之随感

龙登高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在日益广泛与快速的国际移民潮流中，劳动力、资本、技术与知识等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与更深层次流动与组合，形成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变化之快令人应接不暇，随之催发源源不断的学术激情与研究兴趣。

例如，在美国这样一个交通运输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华商竟然在短短十年间开辟了一个新的巴士营运系统——各大城市唐人街之间的城际长途巴士经营。很快地，大学生与各族裔已成为主要顾客群体，经营路线与范围也走出华人聚居区进入主流社区。华商的经营创新与竞争带动了主流大公司的效仿与改革，导致价格的降低、服务的改善与行业格局的改变，从而刺激了巴士业的消费需求与市场的扩大，进而推动了美国整个长途巴士行业历经 40 年衰落之后焕发新生，并在金融危机期间持续逆势上扬，也顺应了节省能源的时代之声。这个有趣案例的经济学与人类学解释引发深刻的启示。第一，华商在美国从族群与边缘走向主流的成长，正是跨越文化、跨越族群经济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边缘推动主流的过程。第二，这生动显示了一个新行业或新市场的自

生自发的演进历程——从混沌走向有序，从混乱走向成熟。第三，创新引发效仿，改变旧有格局，形成新的行业标准，推动行业的变革，从而带来一个行业的新生。

2009年，我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学术讲座，专门探讨这个有些不可思议的经济现象，引发了讨论与思考。这种发人深思的新现象还有不少，等待学者们进行深入考察与学理解释。仍以北美为例，华人基督教会近十年间迅速成为最大的华人社团，其影响日益超过传统社团。同时，大陆新移民从无神论者变为基督徒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与转变，他们对中国的反馈与影响日渐渗透，都激发学术冲动，但种种原因使得目前在国内侨界没有引起反响，仅限于少数留美学者的关注。再如，收养儿童从中国福利院到美国的家庭与社会，如今开始长大成人，这一近十万人的特殊群体，不仅成为新的研究对象，也成为沟通中国与美国的新纽带。

同样，不少与中国相关的现象令人关注。譬如，中国企业“走出去”突飞猛进般的急剧增长，近五年来几乎每年成倍增长，中国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他们与海外华商之间将在互动中成长，开创新的局面。而在此之前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中国商品输出世界，造就了一批新的海外华人富豪，且分布在传统东南亚华商之外的欧洲、拉美、非洲与北美等地。反过来，广州的非洲人，上海的日本人，哈尔滨的俄国人，北京的韩国人、欧美人等国际移民进入中国，也使准备不足的国人与政府有些不知所措，问题丛生。

凡此种种，面对近一二十年乃至近几年出现的新现象与变化，学术研究相对滞后。事实上，对这些新现象与变化进行实地调研和学理解释，与历史进行比较，并探究演变的过程与未来的趋势，进而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管理学、统计学等分析工具与方法进行解释和论述，可望形成原创性的理论，在强化现实价值的同时提升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层次。在这种背景与视野之下，华侨华人研究将在应对挑战中开创新的学术天地。

## 建国六十年来的人类学华侨华人研究

曾少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建国六十年以来，人类学的海外华人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果把田汝康教授撰写的《沙捞越华人》一书的出版（1953年）当作中国人类学家研究海外华人起点的话，那么中国人类学的海外华人研究已经有近60年的历史。该书阐述沙捞越华人的移民过程、华人社团的组建、华人社区的性质、农村经济和家族关系、职业和当地市场经济、当地市场经济和橡胶贸易、权力问题、华人与祖国的关系等，是典型的民族志式的海外华人研究。

大陆人类学的教学和科研机构不少，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但这些机构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很少专门从事海外华人的研究。鉴于中国大陆人类学界海外华人研究相对薄弱这一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于1999年12月成立“海外华人研究中心”。在该中心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于2002年3月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郝时远研究员兼任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于2002年11月在北京举办“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郝时远主编的《海外华人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曾少聪著的《漂泊与根植——当代东南亚华人群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丛书之二也相继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还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文化中心、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和新加坡的八方文化创作室共同主办《华人研究